

威达

面对大洋彼岸的挑战

邓小平复出

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

文革大悲剧

极端主义与中庸之道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2 021 2023 0



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

威达

川新登字 015 号

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

威达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6.5 印张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1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7-5616-1654-6/D·143 定价:9.85 元

目 录

第一部 莫斯科——北京	(1)
△极端主义与中庸之道：苏联人和 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	(15)
△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	(31)
△斯大林主义与维多利亚时代之杂交	(68)
△乡村生活中的愚昧	(96)
第二部 伟人——斯大林与毛泽东	(111)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内幕.....	(123)
△大清洗与文化大革命.....	(139)
△垂暮之年.....	(168)
第三部 北京之春	(183)
△邓小平复出.....	(185)
△政治局的秘密计划.....	(20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15)
△民主墙.....	(228)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243)
△再度百花齐放.....	(273)
△收车.....	(316)
第四部 信仰危机	(369)
△思想解放与改革.....	(380)
△探索改革之路.....	(399)
△对峙.....	(426)
△第三次寒流.....	(446)
△悲壮的葬仪.....	(480)
第五部 强权政治	(495)

第一部：

莫斯科——北京

- △极端主义与中庸之道：苏联人和
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
- △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
- △斯大林主义与维多利亚时代之杂
交
- △乡村生活中的愚昧

中国是世界上遭人误解最多的国家。其原因部分在于那些蓄意引人误解的宣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由于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和苏联的自身特征，因此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往往抛开通常的批评标准，而忘记了中国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一样，都有相同的需求与动机，忧虑与激情。林肯·斯蒂芬斯三十年代从苏联回国后宣称：“我已经看到了它的未来，并且，它正为之而努力工作。”而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一系列从北京回来的旅游者，包括那些对毛泽东改变中国人民的努力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认为，毛泽东的制度已显示出它的特征，并获得了一种苏联所缺乏的真诚。然而，中国与苏联共产主义之所以有区别，较少地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更多地基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样，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困难，也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文化。

六千年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中心，在没有重大的外来影响下独自发展着。当西方的祖先在欧洲用靛蓝画出蓝色时，中国的绅士学者们已经在画着那些配诗的卷轴画了，它们的美丽历千年而不凋萎。中国的工匠发明了火药、瓷器、印刷术与造纸，而且，中国也最早采用了文官考核制度，它们先于欧洲人一千年或者更早。

但是，文化的坚实与封建的隔绝一道形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色，到后来终于成为一床令人窒息的毛毯，保护陈旧的思想行为方式拒绝和排斥新的思想观念。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可以与两个超级大国鼎足而立，它有能力发射并回收人造卫星，能够独立自主地建造和部署核武器，把洲际导弹发射到莫斯科或华盛顿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国家，其保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彻头彻尾的西

方传统主义者。在那里，农民溺死他们的女婴，一亿人食物短缺，数亿人民为求得生存而过着艰苦的生活。

毛泽东的革命刺穿了封建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茧壳，但却并没有完全摧毁它。虽然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是，与上个世纪一样，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如何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从过去的重负下解放自己。

一方面是一个大国，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封建农民，这双重的因素使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其它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也有新与旧、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但是，它们远没有中国那样突出，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简直可以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大约六千万到八千万之间的人，精明而受过教育，如果条件得当，能够与日本匹敌；但是，更为主要的是大约九亿农民和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城市劳动者，两千年来，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剧变，毛泽东也反复强调“向群众学习”，但是，城乡差别的鸿沟依然存在。一九七九年，一位中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告诉我：“你不能够想象乡下人是如何生活的，甚至我们也不能理解。”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数百万“知识青年”（城市的中学毕业生）被送往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劳动，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全然没有思想准备的世界。一位青年后来写道：“多亏了下乡的体验，我才终于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面貌：农民的落后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中国要取得真正的进步，首要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那正是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有限的成绩。一位青年人回忆说：“对

于他们，我们就象是收音机或电视机。他们知道了在他们生活的天地之外，还有另外的事情，另外的世界。”尤其是，对于乡下青年来说，那些从城市去的青年男女就象是为他们打开了知识的窗口。他们模仿其举止和言谈，并常常在他们的房屋周围逗留，以便学得更多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第一次看见刷牙，第一次听说水能够从管子里流出来，而不用桶到井里去打。

尽管知识青年开阔了农民的眼界，但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他们却为农村带来了负担：额外的口粮，不能够自谋生计。反过来，知识青年生活在农村也象是一种国内的流放，除了调回城里工作而外、别无合法的出路。而调回城里工作全靠运气和官方关系。

成千上万的下乡知识青年私自回到城市。但是，他们不再有城市居民的户籍，也不能够获得工作和粮食供应证。于是，他们形成一种易于犯罪的亚文化群，或靠着家庭供养，或凭着施展小聪明过日子，有的人由此而成为小偷，还有的人跑到边境，冒着被溺死和被可怕的鲨鱼吃掉的危险，非法越境到香港或澳门。五分之四的非法移民都是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一九七九年夏天，边境巡逻相对松弛，每天都有超过一千的人到香港寻求庇护。而且，非法越境也不限于南方，在西部，知识青年偷越进入缅甸，在仰光参加反对政府的组织。在北方，一些人甚至跑到苏联和北朝鲜——与北朝鲜相比，中国反而是相对自由的国家，因此，一个取名为约翰·弗雷泽的青年跑到那儿之后，又在一个警察追捕的夜晚十分困难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下乡知识青年逃离农场，有的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乡差别的一种量度。此外，一个最

为重要的体现在于，中国人把拥有城市居民户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一个小县城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最大城市一样，它都是众人争取的对象。一九七九年，山西省应县的县城扩展，《人民日报》报道说：“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新建城区。”县委成员带头把自己的亲戚迁进城里，一条新街住满了当地干部的亲戚，以至居民们称它为“权威街”。

户籍限制也阻碍了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通婚。如果一个知识青年与一个农村女孩结婚，那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回城的一切希望。一些下乡女青年这样做，那或者是因为爱情，或者是因为种种缘故（如为了获得较为轻松的劳动）已经与村干部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因而感到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结婚。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家庭也总是加以劝阻。其实，自我意识更强的年轻人是决不会自愿地把她（她）们的命运与一个农民单调麻木的一生连在一起的。

这种阻碍十分绝对，甚至在一个小镇与毗邻的公社之间，通婚也常常是不可能的。在江苏省的一个县城，一个名叫卢玉红的女孩爱上了附近村庄里的一个农民青年，她的父亲强烈反对，只因为那男青年是一个农民。起初，父亲打女儿、强迫她与男方断绝关系。后来，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某一天，她的父亲和哥哥看到她正在家外与那男青年谈话，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当着她的面毒打那男青年，直到活活打死。事后，他们还狠狠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打死了他，我们坐牢抵命。结果，父亲被枪决、哥哥被判了十年徒刑。

这种极端的事例当然不常见，但也决不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户籍限制的严格，以致生活在不同城市之间的人也较少通婚。因为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无论哪一方的工作调动和户籍迁移都相当困难，所以，他们有可能不能在一起

生活。城市越大、生活水平越高、文化设施越好的地方，这种困难就越突出。因此，北京、上海和天津是最为困难的地方。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设法进入这些城市。一九七九年，大约二十五万人运用各种手法企图进入北京，其中不少人采取了欺诈等不正当的手段。

苏联也有类似如此的制度，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是重点限制的城市。但是，在苏联，结婚本身就能够提供在某个城市居住的条件。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内地女青年（有时也有男子）只为获得进入某大城市的允准而与该城市的人订婚。玛丽娅·赛奇奥娃，美丽而受过良好教育，她嫁给一个长期酗酒的人，只因为这人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子，而又正好犯流氓罪被监禁起来。基雷尔·阿列克赛亚兹，哈尔科夫城的一名男护士，与一个年龄足以可做他的祖母的老妇人结婚，目的在于获得莫斯科的户籍。我所认识的一个男人，他没有任何别的动机，与他的内地妻子离婚而与一个莫斯科人结婚，然后，他又再次离婚而想与先前的妻子结婚，当局因此取消了他的莫斯科户籍，因为法官认为他这是为使自己的家庭弄到莫斯科户籍而蓄意采用的手段。这种欺诈并不罕见。

户籍限制能够用来作为行政管理的手段，例如限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一九八〇年一月，萨哈洛夫就被流放到高尔基城。不过除了三个最大城市外，苏联较中国的户籍限制要松得多，即使在三大城市，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无户籍而生活在那里。苏联一般城市的居民可以相当容易地从一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限制仅仅在于膳宿供应的短缺和官僚主义者的非难。当然，这种方便只适于城市居民，虽然与中国相较，苏联的城乡差别要小一些，但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苏联也仍然象是两个国家，其人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苏

联农民虽然已远远脱离了中世纪亚洲农民的苦役状态，但却仍然是地道的旧式农民，代表着一种在其它地方几乎消失了的的生活方式。

在莫斯科郊外，离克里姆林宫不到十二英里的地方，是一些旅游者难以看到的村庄。两排东歪西倒的木房子带着精雕细刻的窗框，就像是查格尔油画的作品，一条未经铺砌的小路混和着融雪和泥淖，点染出质朴而生动逼真的风格画。有电——在莫斯科江岸的一边，写着巨大的列宁口号“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是没有电话、没有商店。甚至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也不得不从井眼里面去打水。如果你想洗澡，则必须首先劈柴生火。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在苏联也正在缓慢地消失。一年秋天，我在莫斯科郊外的这样一个村庄遇到一位老人，他正在耕地。他告诉我，在五十年前的集体化之前，村里有二百口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耕马。现在，年青人已经全部离去，他的马还剩下了一匹。在更远的北方，在雅罗斯拉夫尔和苏兹达尔，那是旧俄罗斯的腹地，白桦林和绵延起伏的群山之间，村庄凄凉地躺着，荒无人烟，人们已弃置了土地而出外另谋生路。

在苏联，这样的移居是被允许的，虽然也有严格的限制。因为它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绝大部分欧俄地区，人口没有什么增长：几乎三分之二的家庭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只有百分之六的家庭有超过两个的孩子。因此，尽管苏联在世界上属于人口第三大国（两亿六千万），但是，仍然有一个日益加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百分之九十的苏联工龄妇女学习或有全工作日的职业。在欧俄地区，出生率还在持续下降，并形成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三分之二的退休人员至少工作部

分时间，这一方面由于苏联退休金的不充裕，尤其是对于低工资来说，另一方面也由于传统大家庭的日益解体、老人有意识地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样，作为劳动集体——“第二家庭”，象苏联报刊所称的那样——的一员，可以填补由于家庭年轻人出走而带来的空虚。

然而，尽管苏联劳动力短缺，也仍然有失业的发生。苏联法律规定，犯罪分子没有劳动的监禁期不得超过五个月，但这是针对懒汉和流浪者而言，是为了反对“寄生虫”生活，而不是针对一般人。真正的，西方意义上的失业，在苏联占千分之十左右，又主要是在中亚地区。在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最低，出生率也与欧俄地区相反，正不断上升。

直到一九七五年，十年间，大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民离开村庄进城，为苏联工业提供劳动力。在那一年的五月，由斯大林强加给农民的“第二阶级”成分被最终解除，斯大林原本以此来把苏联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现在，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宣布发给农民以国内护照——一种身份证。这样，农民们就能够与其他苏联公民一样，走出他们的家乡而外出旅行。这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措施，以此来放松对农民入城的控制。当然，一个农民在实际离开自己的村庄之前，也需要经过允准，在入城之前，需要先找到一個工作。而且，也不是所有希望离乡进城的人都能够如愿。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调查表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想离乡进城，年青人则可能达到二分之一。但是，无论如何，城乡之间的阻隔由此而减小，而且，在未来的十年内，苏联的劳动力预计还会减少，因此，户籍限制可能会进一步放松。

中国的问题与苏联相反，劳动力的大量过剩使许多人没有工作。一九七九年四月，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披露，在一亿一千万城市劳动力中，大约有两千万人失业，其中包括一千二百万左右的青年人。这种状况的部分解决是大力发展小型的集体企业、并对服务性行业和个体经营者放松统一管理和限制。但是，到一九八〇年初，年青人当中的失业率仍然是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且，整个八十年代，由于六十年代出生率的激增，到现在，都成为了需要工作的年青人——在城市，大约每年有三百万，在农村，则每年大约有两千万，因此，失业率还将上升。再过二十年，除非工业令人满意地发展，现行的出生限制政策取得成效，户籍限制才有可能放松。

中国的人口如果继续按七十年代中叶的比率上升，那么，在一百年内，它就将达到四十二亿六千万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世界人口。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大量人口将饿死，政府崩溃也会首先发生按照它现在的增长率，将近百分之一一点一七，那么，到二〇八〇年，中国的人口将是二十一亿左右，仍然有现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但却仅仅生活在世界可耕地域的百分之七之上。因此，一九七九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目标，力争在本世界结束时把人口稳定在十二亿左右，这就意味着，到一九八五年，人口增长率必须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五（即现在苏联的水准），也就是说，每对育龄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最多两个。一九八〇年，一个修订计划提出，百分之九十的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

在一个保守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完成这宏伟的目标显然是功绩卓著的，也必须是困难重重。因此，一种严厉的强迫制度已经被采用。在苏联，据说妇女的产假是为期两年，并且有增加孩子的津贴。如果一个妇女有了十个孩子，则国家奖励她为“母亲英雄”。与此截然相反，在中

国，一个妇女需要等到自己的轮次才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她到期没有能够怀孕，则又需等待三到四年，直到她的轮次再来。中国也有“计划生育光荣”的奖励，但要保证不生第二个孩子的夫妇才能得到。它主要体现为大约占职工年收入百分之五的奖金——独生子女费，一直付到孩子满十四岁为止，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和谋求职业等方面，独生子女也享有优先权。但是，如果有人违《约而生第二个孩子，则要求付还全部的奖励，无论是谁，只要生第三胎，则被处以罚金，金额占一个职工收入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也是计算到小孩子长到十四岁时为止。而且，如果再生，罚款再增加，每超生一个，罚款增加年收入的百分之五。

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支持经济制裁的各种非法律性措施也被广泛采用。一些省份明确规定不准生三胎。一些地方已发出警告，反对那些散布谣言、打击陷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破坏人口控制政策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那么，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则是使国家永远处于贫穷的状态。

据陈慕华副总理透露，自从共产党获得政权以来，国家、集体和个人家庭已花费了一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千亿美元），大致占中国一九七九年三十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来抚养自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六亿孩子。如果出生率下降一半，那么，就可以有一千五百亿美元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中国到现在也就只有七亿人口，而不是九亿八千万（象官方估计的那样），一切事情都要好办得多。“二十年前，我们就该开始了”，王任重副总理一九八〇年夏天说。但是，二十年前，毛泽东正在坚持他的：“中国人口越多，它的发展会越快。”而且，那些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例如马寅初教授，正遭到贬黜。中国人口的庞大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沉重

负担，而且，他对此应负严重的责任。《人民日报》也承认了这一点，一九七九年七月，它在一篇文章中问道：“难道主张人越多越好，主张无节制的生育，使人们永远处于为糊饱肚子而奋斗的状态中，才叫做对六亿人口有感情吗？”

虽然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三十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翻倍，但是，人均却仅仅增长百分之二十。在城市，住房条件较一九四九年更为紧缩，人平室内面积减少百分之二十。据报道，在医疗、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美国和西欧大约有百分之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苏联是百分之二十，中国则是百分之四十，这是中国与苏联经济落后的一个量度。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与苏联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划分成两个部分的：城市和乡村，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不是如此，因此，独立地比较农业生产人口是容易导致误解的。在一些领域，包括某些科学和技术方面，苏联和中国的成就是其它任何国家望尘莫及的。

中国最先取得了全副地震仪的成功，在地震预报方面，中国居于领先地位，在“哥德巴赫猜想”的深奥数论问题上，中国的一位数学家亦得到了国际上的证明。苏联的焊接技术和超高频电力输送系统，最先进的；苏联的军事装备足以和西方匹敌（中国的武器装备则落后二十五到三十年）。但是，尽管苏联的武器装备与西方相等，但在尖端性和复杂性上却不及西方，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联军事设计者的不虚伪态度、另一方面却基于苏联的一些技术空白：苏联没有巡航导弹，也没有中子弹，因为它尚没有能够发展它们。

一九八〇年，中国有二千四百台计算机，苏联据估计有四万台，美国则有十三万台，外加五十万台小型计算机。苏联的 TU144 型超音速客机，外形和主要方面都直接仿照英法

合制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一九七七年，在迟于原计划三年后在国内开航，但是很快又停航，因为苏联的机械师不能够复制这种超音速客机的工艺和技术。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只好弃置了。七十年代末，中国的飞机设计师试图在上海仿造波音 707，那时，中国已在早些年买进了十架。然而，由于引力中心的位置不对，中国的仿造机始终未能起飞。尽管苏联在一九七六年首次成功地送回了金星表面的照片，但是，一般说来，苏联的空间技术较美国要落后七到八年，并且，有高得多的失败率。中国的空间技术则尚在五十年代末的水平上，八十年代，它可能有能力带人进入天体运行轨道，虽然不可能有很好的选择。

关于苏联和中国发展比较的任何国外评价都必然是主观的：即使有所有的有关资料可资利用——事实上当然不可能。相同还是不同，这不可能直接地比较。在文化传统、奋斗目标、发展重点和经济状况诸方面，苏联和中国是不同的，它们各自与西方国家也是不同的。不过，排除各种误解，苏联技术可以被认为落后于西方五年到十年，而中国则落后二十年到三十年左右。

如果这差距往往看来更大，那是由于各个国家技术吸收与应用的困难。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钻一口一万六千英尺的油井，美国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苏联则需要五年，主要的原因在于苏联钻头质量的可怜。一九八〇年，在卡特总统禁止之前，一个价值六千万英镑的美国钻头厂由得克萨斯的一家商行卖到了莫斯科。这改善了苏联钻头生产的技术，但是，由于苏联首先满足武器工业高级钢材的需求，而苏联与中国一样，很少生产特殊需要的高级钢材，过多生产一般低级钢，所以，竟然没有高级钢材来用于钻头生产。这

显然既有技术的问题，也有经济管理的问题。与钻头生产这样的例子相似，苏联的大型计算机主要仿照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 IBM360 和 370 制造，这在美国是十年到十五年前的产品。苏联的仿制品连彩色编码都一模一样，但是，由于苏联机器工具的原始，不能大规模地生产精密部件，所以，仿制的计算机也不能批量生产。加之，程序编制不充足，使如此大型的计算机仅仅发挥出小部分的功能。

技术差距和管理问题一道，反映出生产力的低下。即使按照苏联自己的数字，平均计算一个苏联工人也只能勉强生产出他的美国同行一半的产品，一个苏联农民的生产能力是一个美国农民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于美国十倍、农业生产效力则低于五十倍。一九八〇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二万六千二百六十亿美元，苏联据估是一万一千七百亿美元，中国据报导，只有二千四百五十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

苏联以美国作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进步。赫鲁晓夫曾经宣称，以他们在未来十年内所获得的充分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到一九七〇年，苏联将赶上并超过美国——而不仅止是西欧。虽然这种自夸似乎已悄无声息地被人忘记了，但是，整个七十年代，苏联的时事评论员却总是力图使电视观众们相信：帝国主义政府之所以乐意发展与莫斯科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关系，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每年，在采煤、肥料、原油和生铁产量等方面、苏联只要有超过美国的成绩，就必然通过宣传工具大加宣扬，一一列举。甚至，毛泽东也在大跃进期间宣称，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五十年内超过美国。

或许，国民收入也并不是测量发展水平的十分简单明了